青年学者圆桌讨论・贯通的清代政治史

清史与近代史研究的“彼此系连”与“交互映发”

戴海斌

一

众所周知，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1616年（或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的1636年，或清军入关的1644年）算起，直到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此近三百年都是清朝。1840年至1912年，单立了一个名目，曰“晚清”。上溯各断代史，我想到类似说法有“晚唐”“晚明”，前者判分公认以安史之乱为界，后者一般以万历朝为始，《明史》即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所谓“晚”，不仅指向特定历史时段，也含有近似“迟”“末”之类、理解一代王朝兴亡盛衰的意味。我又想到，晚唐、晚明之断限虽然主要出于“内部”视角的王朝史本身脉络，但不约而同似均受到相当程度的外部因素影响，如讨论前者经常提及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政治之关系”，又如后者之所以构成“大变局”者，最值得注意的是“海禁—朝贡”体系的突破、第一波西人东来与西学东渐、白银流入以及著名的“江南资本主义萌芽”。陈寅恪讲唐史，便也别提醒学生“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唐史，则一般皆以为与外族无关，固大谬不然”，故主张“应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①

不过，与唐史、明史自成断代史体系不同，作为“近百年史”的晚清一段，实际被纳入近代史范畴，似一直缺少自主性。就学科亲缘关系而论，晚清史离1840年前的清朝中前期史为远，反而离1912年后的民国史为近。② 这当然和近世本身展开，以及“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

[收稿日期] 2023-10-29
[作者简介] 戴海斌（1978—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433，daihaibin@fudan.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晚清外交文书研究”（23&ZD247）阶段性成果。

①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70页。

② 近代史研究注重的线索、高潮、标志性事件多为革命史观所规定，故研究重心多倾向清政府的对立面（农民起义、维新派、革命派、群众运动等），晚清史研究对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反而研究不够，所谓“研究不够”，并非认为其不重要，既有晚清史著述均无法忽视国家权势结构的存在，但很多论述中清政府性质是自明的，且高度抽象，这种抽象最常见的形态就是在具体问题分析中直接应用某些被普遍接受而不会加以质疑的结论。其实造成一种悖论：一方面将清政府形象固化，较少关心其内部变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往往将外部反应的原因径直导向清政府，赋予它太多的解释余地。参加戴海斌：《多注意“史料的历史”和“中等人物”》，《流水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16–217页。

史有关，不必赘述。但有必要一提的是，民国学人在讨论“近代”（或基本同义的“近世”）时，实已有不同见解。据顾颉刚观察，一派认为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前不同，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分界，“故近世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此以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为代表；一派认为“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故从鸦片战争开始叙述，此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代表。[①] 关于“起点”界定，二说固有差异，然定义“近代”的标尺——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变化——实际雷同，只是感知到“新的关系”的变化程度不同罢了。西方许多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喜欢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放在 1800 年这一纪元上具有标志性的年份，如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书名即“*Late Ch’ing, 1800—1911*”，就其逻辑而言，和国内学者的分期似无二致，也是建立在一种中西差序文明的认知之上。其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又常使用“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的概念，某种意义上，此说是对以往“中华帝国”概念的修正，相对淡化那种“传统 / 现代”的二元对立，而注重挖掘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的活力和自身的变化逻辑。[②]

清季民初一段，是我们习惯讲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或转型时代。近代史研究一般比较注意新的、变化的因素，在研究视野、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一些固有框架，或者说套路。但常识也在时刻提示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即历史是连续的，研究历史不能取截断众流式做法。以“承通史家风”自许的清儒章学诚，表彰“别识通裁”，尝批评“断代为书，各有裁制，详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抵牾之端，从此见矣”。[③] 今人在讨论晚清史问题时，一旦过于纠结于研究对象是“近代史”抑或“王朝史”，则“抵牾之端”亦往往相应而生。复旦前辈朱维铮先生写过一本极著名的书——《走出中世纪》，尝检讨以 1840 年为近代的开端（即中世纪的终端），指出：“这个界定无疑具有充足理由，但也越来越像一道鸿沟，将中世纪研究与近代研究隔成两个壁垒。结果呢？分工的畛域日趋板结，双方很少越过那道 1840 年线。但研究的逻辑取向，又必然使双方非越过这道线不可，但多半限于思想的超越。为了论证迈进近代化是必要的，便难免在回首时尽量指斥当年如何封闭、昏暗、落伍……一个社会，自上而下都自以为处于盛世，其实是处于衰世，它难道能依据内因而‘自改革’么？”[④] 朱先生是从经学史、思想文化史的学术背景下走进中国近代史的，他所谓“走出中世纪”过程的开端，至少可以上溯至 16 世纪晚期，即我们习称“晚明”的时代，他主张“研究不可无所畛域，但不可囿于畛域”，笔下讨论“从晚明至晚清”历史，无论具体议题的设置，还是思想资源的援引，往往自出机杼，生面别开，很不同于一般的“近代史话语”。

1840 年前后，同属一个清朝，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起点，是学科史的一个定义，不能取代历史本身的研究。我们处理“近代”议题，固然可以在时段上规定为做 1840 年以后的历史研究，但实际应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断代自我设限，在关注外部冲击与影响的同时，不忽视中国社会的内在连续性，研究新的、变化的因素，也要对旧的、相对不变的那部分有所理解，

---

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75 页。按此书初版于 1947 年，为方诗龄、张维华、童叔业执笔。

② 较早使用“晚期帝制中国”这一概念的学者是孔飞力（Phillip A. Kuhn），1970 年出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一书质疑以往的“近代史的时限”，指出“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其使用“晚期帝制中国”一词，意在跳出王朝循环窠臼，从中国社会内部入手，强调中华帝国发展的内在连续性，淡化外部冲击的影响。（引文见中译本，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 页）其后，西方著作对此概念援用，指向扩大，从晚明至 20 世纪初期将近 400 年时间均可称作“晚期帝制中国”。20 世纪 90 年代后，“新清史”强调的满洲独特性和在全球视野下考察历史的趋势暴露了“晚期帝制中国”概念的缺陷，即强调同一性，而忽略差异，使得清代的独特性被湮没在明清一体框架中，加上此概念对西方影响的淡化，易使学者失掉全球视野，陷入一种“中国中心主义”教条之中。参看吕杰：《“晚期帝制中国”考——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中的“关键词”探讨》，《学术界》2011 年第 8 期。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 · 内篇四 · 释通》，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册，中华书局，2014 年，第 436–437 页。

④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6–7 页。

因为只有在“旧”的基盘上，才能了解“新”的意义，予它合适的定位。此所谓通观的眼光。这也是近人经常引用的蒙文通“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一语的意思。

据说历史学科内部存在一个潜在的鄙视链，古代史鄙视近代史，近代史鄙视世界史。这么说肯定不够“政治正确”，我认为近代史决不应该鄙视世界史，但理解古代史鄙视近代史，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近代史做法太粗放，最集中表现在不会用史料；二是近代史研究太单调，受外来概念、框架乃至政治性因素影响大，习惯于建构“宏大叙事”，动辄某史观、某主义，自陷于“学科”所定义的种种格套而不自知。现有近代史著述，体现在某一端的偏狭、局限和套路化，是不容讳的。再则，这个学科自带一种理论饥渴，总是希望“预流”，范式一成不变，诚是一种单调，变得太快、太趋时，同样也不免单调。章学诚讲“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①] 针对的是乾嘉学风，当代有识之人同样应当自省，而思补弊救偏。以个人的粗浅体会，做史学研究，从后面往前追补，好似逆流而上，是很难的，而从前面向后延伸，顺流而下，则比较自然，也更合乎学术理性。

王充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②] 我个人有一个观察，即研究近代史有大成就的学者，对“旧学”都有不俗的根柢。“旧学”这个词，对于我们这一代接受当代学院教育的人，立意太高了，我们没有这个训练。我想，旧学，不单局限于古典、经典，可以指传统社会文化的一般常识。如何带着旧学视野观察近代社会，这是我们做近代史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先天不足，则后天找补。无论如何，读过《皇朝经世文编》，再读《筹办夷务始末》《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或者读过《文史通义》，再读梁启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感觉不一样，收获也会不一样。相应的，对清史尤其晚清史有理解，也会帮助我们去研究民国以后的历史。如何建立起相对通贯的历史感觉？我想主要还是应该从阅读史料来。马忠文曾分享日记研究的经验，提示阅读日记是培养“历史感”的最好途径，“看日记就是带给你一种‘穿越’的体验”，他举例说：“我在读《许宝蘅日记》时最大的感觉，就是跟着他直接从晚清进入了民国，经历了北洋、1945 年抗战之后的乱局，再迈入新中国，借着许宝蘅的心灵感知，走入了四个时代。”[③] 同理，读类似较大部头的长程日记，或者一些在世时间长、留存材料富的人物“全集”，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历史感”。

二

以打通拈出新意，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打通何尝容易？清史和近代史之间，隔阂已然明显，即便近代史内部甚至晚清史内部，近来已大有分段治之、冷热不匀、各说各话之势。陈宝琛有诗云“不须远溯乾嘉盛，说着同光已惘然”，这是当事者经历清季巨变后的感喟。我个人研究重心落在光绪中后期，尤集中于甲午至庚子一段，近期以“清流 / 洋务”问题为线索，以李鸿章、张之洞、张佩纶这些近代政治史上“长程人物”（借用“长程日记”的说法）为入口，也尝试涉入同光之际的研究，譬如由辛丑议约时期李鸿章与张之洞以“书生意见”和“中堂习气”互嘲的著名公案，追溯前史，钩沉二十年前李、张二人在京城初晤的一幕及其所处历史情境，从而反思“洋务”与“清流”关系的既有认知。[④]

滥觞于明末，盛行于清季民初的“经世文编”，其特色在于通过选本纂辑表达编者之经世理念，近三百年间前后相承，各本递出，形成连绵不断的经世文类序列。我注意到 19 世纪 80 年

---

① 章学诚：《上辛楣宫詹书》，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下册，商务印书馆，2023 年，第 435 页。

② 王充：《论衡》卷 12《谢短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96 页。

③ 马忠文：《阅读日记是培养“历史感”的最好途径》，《晚清日记书信考释》，凤凰出版社，2021 年，第 270 页。

④ 戴海斌：《清流、洋务“各有门面”？——以李鸿章与张之洞早期交往为线索》，《史林》2021 年第 1 期。

代由盛康出名、盛宣怀主持修纂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以洋务名家统领新编，而体例“悉仍前编（指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维持传统“八纲”规模，这一新旧纠葛的现象不由使人好奇。通过研究，我追溯“盛编”史源所在，发现该编未设“洋务”门类，不能全然归于“歧视之迹”，编纂者也尝试通过变换目类、修改体例，以更符合时人价值观的“得体”方式向读者传递“洋务”观念；“盛编”纂辑前后，盛氏周边亦有多人致力于近似工作，如《洋务纂要》《洋务辑要》《筹办夷务类要》《柔远全书》《夷务汇案长编》一类著述性质大致不出以“采西学”为宗旨的“资料汇编”范围，且受到从事涉外事务的清朝官僚瞩目，此种以“洋务 / 西学”主题类书为纽带引发的朝野互动隐而不彰，实或代表了一种“时流”，值得进一步观察。[①]

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亦如“常山之蛇”，击首而尾应，击尾而首应。从问题出发，寻求解决方案的路线不是规定的，一面可以上溯，一面可以下延。循着清季“东南官绅”群体的衍生流变脉络，我也愈加意识到清季民初在“政事”“风俗”“人才”等多方面的连续性。孟森在今人眼中形象（或言历史位置）主要是清史研究大家，不过，作为由传统士大夫脱胎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其学术研究很难脱离政治关心，他本人有过丰富的政治阅历，活跃于晚清、北洋、国民政府时期这三个历史阶段，用以往之标准衡量，相当于横跨了三个朝代，亦可见中国近代史变化的急速和剧烈。我发现曾经为清季立宪派代表、以进步党骨干在民初国会与国民党恶战的孟森，当“大革命”之际实现政治身份转换，直接进入国民党政治系统，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后，以国民党员身份充任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委员，又担任江苏民政厅秘书主任，其跨度不可谓不大。孟森所经历者正是最复杂、最动荡的一段近代史，通过挖掘这一类“过渡人物”的多重面相，由其个人出处抉择可以探察晚清、民国历史的连续与断裂，进而理解“大革命”展开与递进过程。[②]

傅斯年讲本国人研究本国史，多能“见其精细”，外国人则“每每能见其纲领”。[③] 有位研究清末新政的美国汉学家，提出过一个意义深刻的观察，常被今人援引：“如果把 1910 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 1925 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 1910 年和 1898 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这是新政革命的成果。”[④] 也即是说，所谓延续和断裂是同时存在的，但未必只依赖“改朝换代”的形式发生。如庚子（1900）前后的中国，属于同一清朝，但政治文化承继关系所呈现出来的明显断裂，可能还要大于辛亥（1911）前后的中国，虽然，后一革命导致了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变化。1927 年大革命前后的中国，同属于民国，但在政治体制、文化取向上都有极强烈的断裂性。

以上讲了不少打通这、打通那的大话，希望不要引起误解，学无宗主，枵腹空谈，终究难免章学诚所讥之“横通”，或流为傅斯年批评的那种学术上专讲调和、附会的“古今中外党”。我只想表达，近代史研究应该是开放的，在研究方法上，没有什么特别、专门的东西，不同时段、不同领域甚至不同学科，有很多东西都是通的，好的就应该学过来，为我所用，一旦形成研究成果，也可以用相同或相近的标准去复按、检验和批评。我们在研究上，特别要避免“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此疆彼界，自我设限，自我作古。不见异量之美，难语乎广大教化。这里恕我再引一句名人名言，因它很精准地说出了一层意思，正是我所欲言的：

> 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

---

① 戴海斌:《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纂辑补论》,《中国出版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② 戴海斌:《“大革命”前后的孟森》,《中华文史论丛》2021 年第 2 期。

③ 傅斯年:《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29 页。

④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15 页。

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①]

三

与其他断代相较，近代史料向称繁富，不惧其寡，但苦其多，如陈寅恪所言，“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②] 材料繁多，并非意味可以轻心掉之，予取予求，亦如梁启超早经提示：“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③] 在此意义上，近代史料处理的“精细化”，仍然任重道远。有学者鉴于近年来海量资料不断涌现，大量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指出晚清史领域“大有一种‘富人’的烦恼”，“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正在显现，场中学人更是深受其害”。[④] 当然，研究者如何迈过“改革的深水区”，避免低水平重复，寻求对既有研究领域深翻和实践性突破，自为题中应有之义，唯鄙意以为，至少在史料处理范畴内，晚清史或更广义的近代史学界再“卷”一下无妨，甚且大有“卷”的必要。

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2023 年 9 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文本・语境・诠释：多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学术会议，北京大学韩策教授发表题为《甲午战后恭亲王与翁同龢地位再析：李鸿章家书的新解读》的论文，对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鸿章致张佩纶、李经琇夫妇的一封家书进行再解读，其中有一处关键史料：

> 乐道（恭亲王奕䜣）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龢）则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两宫惟命是从，拱默而已）。

此前学者援引该信，均用来说明恭亲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两宫（慈禧、光绪帝）专依翁同龢意见办事，对其“惟命是从，拱默而已”，似乎甲午后翁同龢真能“一掌遮天”。问题关键在于，信中旁注“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两宫惟命是从，拱默而已”一句，究竟是指恭亲王抑或翁同龢。韩策敏锐注意到影印件所见旁注原文位置，据李鸿章书写习惯，结合当时高层实际情况，研判此句所言更可能指恭亲王，即两宫对恭王“惟命是从，拱默而已”。

韩策重审手札书写格式，辨析旁注与正文关系，正体现了历史学者精巧的“技艺”，示人启发，不过主张旁注一句指向恭亲王，解释仍似未达一间。问题在于，谁对谁惟命是从？“拱默”一词，可指帝王垂拱而治，但亦有表示消极、不作为的用例，并不专指上位者。韩策认为两宫对恭亲王惟命是从，但从相反角度也可以解释，即恭亲王对两宫惟命是从。而且，从李鸿章书写逻辑看，如旁注意为两宫对恭亲王惟命是从，语气转折似过于突兀，因正文尚在批评恭亲王浮光掠影；再则，李鸿章在当时书信中批评中枢、总署大僚的犀利言辞所在多有，但对“两宫”出言褒贬却极少见。针对这一句史料，会议现场讨论非常热烈，历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通过有限的资料不断拓展认知边界，开放式的结论也许比定论更加迷人。[⑤]

尤有进者，此层史料解读意义所在，不止于恭亲王、翁同龢的地位变化，更牵引出晚清政

---

① 钱锺书：《诗可以怨》，《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第 129–130 页。

②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52 页。

③ 梁启超撰，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41 页。

④ 吴四伍：《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及实践性突破——读〈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近代史学刊》2023 年第 1 期。

⑤ 另一评议人李文杰指出书信、日记中的抽象性评价，往往有针对当时形势的具体所指。李鸿章写信前，发生外国公使觐见光绪帝的礼节问题，翁同龢和恭亲王拖延一月，仍未解决。信中“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之语，很可能就此而言，其用来评论恭亲王或翁同龢，均可成立。参见郑西迅等：《文本・语境・诠释：多元视野下的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澎湃新闻》，2023 年 9 月 21 日。

治史上极重要的帝后问题。帝后关系为习见于封建王朝史的传统经典节目，所谓“帝后两党交哄”更深刻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走向，“所关于国运者甚大”。① 由此而论，这一题目正是清史与近代史研究“交互映发”的一个好例。出于“近代史”抑或“王朝史”视域的既有研究，对于晚清政治与制度变革中的“帝党、后党之争”已有不少讨论，② 若能在史料文本再解读的基础上，益以论证逻辑的再检讨，则柳暗花明，未必无有生面可开。

以学术史眼光衡之，用新 / 旧或战 / 和区分帝党、后党立场，以“宫廷矛盾”作为解释晚清政治史的一条主线，并统摄“恭醇之争”“南北之争”等政治派系运作的解说模式，在石泉名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中已见雏形，其认为至甲午之际，“太后与德宗间，虽未必有猜疑之意，而因内、外廷权力之事，对立之迹，盖已显露”。③ 一般认为，翁同龢为帝党领袖，注目“清流”，宏揽名士，甲午战时引用新进，汇成帝党，而戊戌维新及政变，集中反映了帝、后分党的权力之争。此一观点以林文仁著作《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集大成。④《翁同龢日记》为探究帝后关系的一大史料，上揭著作皆有引用，而不同程度存在误读。如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条：

> （按：先谈者为遣翁去津事）既而与李公（鸿藻）合词吁请派恭亲王差使，上执意不回，虽不甚怒，而词气决绝，凡数十言，皆如水沃石。⑤

此处所“请”事，为“甲申易枢”后赋闲的恭亲王奕䜣重入军机，以因应甲午时局。石泉认为“恭王之出山，实德宗与清流人士合谋以促成者也”，解读日记中的“上”，“自是指太后而言”，以此条证明帝后意见不合。⑥ 林文仁注意到“翁氏日记中有其笔法”，称慈禧多用“慈圣”“东朝”“皇太后”之类，“‘上’必称皇帝而非太后”，但将皇帝拒绝所请解释为“德宗虽意向明确，词气决绝，却不甚怒，盖作姿态与慈禧耳”，⑦ 即“执意不回”不具实质意义，只是虚与委蛇的姿态，其目的仍在证明帝后矛盾。吉辰持类似意见，认为“上”只能指代皇帝，“光绪如此表态，是深知慈禧猜忌恭亲王，因而故作姿态”。⑧ 前揭韩策论文，也引用此条，表示“感觉此处‘上’仍应指太后”。

极具意味的是，诸家解读，无论指向慈禧，还是光绪帝，其所欲证明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就前者而言，慈禧峻拒翁同龢奏请，双方矛盾显而易见；就后者而言，光绪帝因深知慈禧猜忌恭亲王，因而故作姿态——帝、后已然分党，在政见上针锋相对。据翁同龢日记的习惯用例以及文意的逻辑推断，我更倾向于“上”指光绪帝，而非慈禧太后，但我对光绪帝当时有否“故作姿态”，是否有此曲折心态，表示非常怀疑。戊戌时人有言“素知后帝不睦，变法非其时也”，⑨ 前面很多说法，也是在知道戊戌政变结果后前溯甲午前后史事从而得到解释，实则帝后矛盾公开化、慈禧太后政治形象负面化，都会影响人们看待戊戌以前帝后关系的眼光。“后帝不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追溯往往过于随意，无视早期帝后君臣交往模式的微妙性，扭曲甚至夸大矛

① 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第 61 条“晚清汉大臣之挤轧”，中华书局，2008 年，第 87 页。

② 刘文鹏、杨瑞：《百年清史研究史 · 政治史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283−298 页。

③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23 年，第 160 页。按，原稿为作者完成于 1948 年的燕京大学研究生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此处立说多受乃师陈寅恪影响，参见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孝钦后最恶清流”节，《寒柳堂集》，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17–231 页。

④ 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⑤ 翁同龢撰，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5 册，中华书局，1997 年，第 2733 页。

⑥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 100–101 页。

⑦ 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第 205 页。按，林说或受高阳影响，后者所著《翁同龢传》已指出“此‘上’指德宗，非慈禧”，并分析光绪帝心理：“他虽赞成复起恭王，但须得太后一言而定。‘恩出自上’的警惕，为以下事上之道。”参见高阳：《翁同龢传》，黄山书社，2008 年，第 188–189 页。

⑧ 吉辰：《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21–22 页。

⑨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节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 戊戌变法》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464 页。

盾。我想到另一例子，甲午十月十三日翁同龢日记中记有“土木、宦官”二事，一般据字面义解释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和宠信李莲英，石泉特别指出“土木、宦官诸事之不洽清议，则尤昭然在人耳目，翁同龢且尝言于德宗之前”，① 此后学者几无例外地将光绪帝赞同下诏罪己视为针对慈禧的抗争乃至羞辱。问题是两宫关系究竟不和到何地步，以致翁同龢敢做出位之思、光绪帝要借罪己诏泄愤？新近有研究认为，翁氏所谓“土木、宦官”，指明季的土木之变和英宗宠信宦官王振事，此论符合其人一向委婉的言事风格，同时以古论今也是晚清士人常见的言说方式。② “上”“土木、宦官”，究竟何指，尽可见仁见智，但避免从既定结果出发找寻“帝后君臣失和以及帝后党争的关键证据”，确有所见，这提示我们要更细致地解读史料，观事实之始末，察风势之变迁，尽量警惕“倒放电影”式的后见之明。

四

吕思勉引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将历史上的重要政治现象，概括为“理乱兴亡”与“典章经制”两大端，③ 如果对应于当下史学内部分工，大致指向政治史与制度史。在我理解，两者不是平行的关系，后者也是解释前者的最要前提。晚清士人孙宝瑄在戊戌年（1898）有言：“读史之要，必精求其制度。廖季平云：说经者亦必精求制度。然哉！然哉！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④ 邓广铭先生著名的“四把钥匙”之说——职官、地理、年代、目录，究而言之，“职官”即是制度。中国历史有举世无双的连续性，而制度对于塑造中国社会面貌具有巨大的权重。制度内在具备一种“通”的质素，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下选择。制度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事件发生的背景板，也是结构分析的线索。近代是以“变”著称的时代，却正适合以“制度史观”⑤ 原始察终、知常观变。在我接受史学训练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古代官僚制度研究的深厚传统，近年又发展为“走向活的政治史”的新取向，前辈学者已贡献具有典范意义的代表性著作，他们的学生辈或更年轻一代学者也多有探索和创获。这一风气对近代史领域有所影响，一些同辈学者在近代文书流转、制度运作及政治决策研究方面已有很好的成绩，即便非以制度为直接对象的研究，如果没有制度史研究打下底子，也是很难达到现在的深度，给人这么大的冲击。

我想简单介绍近年比较关心并正在着手推进的一个题目——“晚清外交文书研究”。近世中外交往日繁，至五口通商条约体制建立，中国有所谓近代外交。缘于清朝外交体制的特殊性，19 世纪 60 年代以降，政府内部“总署外交”和“地方洋务体制”仍然长期并存，相应产生的交涉文书存在复杂样态，其文书性质与文书效力也有别于西方议会制国家的“外交文书”。⑥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在传统宗藩体系内，晚清中国与朝鲜等属国交往中产生的诰命、敕谕、表文、奏文一类文书仍由礼部经办，而 19 世纪开始通行的外交电报和公文，则是近代国际环境、机构制度、通讯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新式文书。总括而言，晚清外交文书体量庞大，形态复杂，研究取径上，除了照顾外交文书的基本分类，尤应考量清代外交体制的特定背景因素，不宜过分追

---

①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 154 页。

② 杨雄威：《“土木、宦官”所指何事——甲午和战纠葛中的帝后君臣与朝政批评》，未刊稿。

③ 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8 页。

④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246 页。

⑤ 阎步克：《以“制度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147–154 页。

⑥ 对于中国外交文书研究有开拓之功的日本学者坂野正高，在定义“外交文书（diplomatic documents）”概念时，参照的主要对象即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参见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ヴァスコ・ダ・ガマから五四運動まで》第一章，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 年。

求“大而全”，择其要者研究，争取重点突破。[①]

外交文书在以往研究中基本上作为史料简单应用，较少被当作一个整体，置于晚清中外交往的时代背景和制度语境下加以审视，对其产生、流转和阅读，以及史料化和档案化的整个过程鲜有注意。即便作为史料文字运用，亦不能注意到当时文书制度性及作为外交辞令的一面，导致相应的研究高度及准确性有限。近年来近代文献资料大规模影印出版，原藏于各档案馆、图书馆的晚清外交文书也纷纷披露刊行。如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相继编印《总署奏底汇订》《晚清外交会晤并外务密启档案汇编》《清末民初出使外洋外务密档》《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及其续编等，尤其末一种正、续两编，规模逾百册，内容丰富，相当重要。粗略言之，这批“外交档案”包括总理衙门及外务部时期原档、清档。其中总理衙门问答簿、节略簿为外交会谈场合的备忘文书；总理衙门密启簿为总署大臣与地方督抚密函汇编，多关系地方交涉事件。外交档案如何能入藏图书馆？又何谓“孤本”？其与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总理衙门、外务部档案关系如何？诸如此类，恐怕连编者也不尽了然。研究者对影印文献拿来就用，也不能说没有问题。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外交文书”，已经不可避免地包含流转、归档、编辑、整理、刊印等多种因素，在重建晚清文书制度，辨析文本源流的工作基础上，对它做批判性利用，自然为研究戒律。[②]

关于制度史研究，学界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共识，即制度是“活”的，不再拘泥于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规章，转而投向动态的、灵活多变的实施方式和功能效用，并力图借此将制度与文化、社会群体乃至思想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③]对于晚清外交文书的再研究，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检视具有“成文性”的典章制度的一个机会，揭示文书制度中“显性”与“隐性”因素，进而理解晚清内政与外交联动的内蕴。按照外交文书的一般分类，国书、照会、条约、章程、督抚奏折、电报、公函、领事报告等正式外交公文，为目前研究凭借的资料之大宗，总理衙门问答簿、北洋寄总署问答记略、驻外使领与各国外交人员会谈记录、地方交涉问答记略及笔谈资料等外交会谈记录文书，极少为人注意，而恰恰是后一类文书较多展现出晚清中外交往的一般交涉和日常状态，也更能反映外交行为的博弈特征，呈现双方或多方的折冲樽俎、讨价还价，具有更强烈的“现场性”。[④]易言之，两类文书正可以对应于一般外交事件的“过程（外交博弈）”与“结果（外交决策）”，若合而观之，可以更加立体、多元地呈现外交活动面相。相关外交人物流露出的思想观念及其渊源、形成、表达乃至于影响实践层面，均有研究考察价值，堪为近代中国所谓“走向世界的挫折”进一解。再则，外交文书与语言问题息息相关，往往存在双语、转译现象，文书流传阅读过程，也时有“误读”发生，文本细读、比勘互证，大有可为。以上工作除了直接推动外交史研究，对于晚清机构、制度、人物以及政治史、思想史、翻译史等多方面研究，也必多所裨益。

以上拉杂所谈，只是自己基于近期工作的一点微小心得，不成系统，未必得当，也谈不出什么“新”的东西。古人讲“书成而例自具，犹之文成而法自立也”。空谈方法无效，最好自己做出成绩来给人看，否则言之谆谆，听之藐藐。愿以此语自省，并与大家共励共勉。

---

① 如清朝自身系统内的“国书与照会”“地方交涉文书”“驻外使领馆文书”“中外会谈记录文书”“中韩宗藩交涉文书”，以及对手方的英、法、美、日等国外交公文体系与晚清外交文书关系研究，都是较有价值且具可行性的研究子方向。

② 可加措意并具体展开的问题包括：文书与各衙门关系，文书与外交程式，文书的草拟、流转与阅看制度，文书的保存与档案化，近代外交情报网络与外交文书，近代通信技术与外交文书，保密制度与外交文书，等等。

③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为例》，阎步克等：《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第 107–136 页。

④ 关于总理衙门问答簿等晚清外交会谈记录文书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思路，经与张晓川教授交流，多承提示意见。